

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

——以语言文体为例

王本朝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问题,认为《圣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创造,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世界,尤其是对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圣经》资源 语言与文体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现代社会、历史、个人和心理等多种力量和资源共同创造和建构的,有其复杂多样性,并不完全符合后来文学史所追认和描述的单一的有其必然性的历史进程。追溯创造它的意义和形式的资源不得不提及《圣经》。早在上个世纪之初的周作人,就在他的一篇与《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有着同样历史地位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圣经》之于中国文学精神和形式重建的意义。他认为“《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的影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理由是“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希伯来思想与文艺,便是这多种思想中间,我们所期望的主要坚实的发行的努力。”^①周作人的真实意图是用《圣经》来作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调剂”,产生“中和”作用,打破中国传统的“固定”和“中心”所建立的“惟一”性,实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多元化进程。我认为,《圣经》与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文学和民间艺术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一起

共同参与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和形式世界,使之逐渐走向了非中心、非单一的多元化。《圣经》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多方面的意义资源,就其语言文体而言,它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抒情方式,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抒情化的审美传统。尤其是它的自然而简洁的语言、象征与隐喻的结构,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股强大的非写实的话语力量,并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产生文学的冲突和张力,在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叙事的背后坚守住了心灵叙事和情感想像的象征力量。

《圣经》拥有丰富的神学和文学内涵,它既是基督宗教的文化典籍,也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文学经典。尤其是西方文学,可以说是它的互文性文本。对中国文学而言,《圣经》的汉译始于唐代景教时期,在这以后逐渐出现了各种汉语译本,从文言到白话,从片段到整体,直至1919年才出版了“国语和合译本”的《圣经》,它是至今最为流行而通用的白话《圣经》译本,也是发行量最大、翻译质量最高的汉译作品之一。中国现代作家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资源在传统四书五经之外,更主要的是

西学知识,包括作为西方文化经典的《圣经》。现代作家接触《圣经》的经历以及所形成的知识关联,只有在其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想像和创造的过程中才能凸显其本土化和个性化的复杂意义。相对说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与《圣经》的文学资源比接受基督教义有其更便捷的通道,作为宗教组织形式的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帝国主义殖民和文化霸权的历史,基督教义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科学、民主和个性等价值理念也有冲突和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现代作家对基督教义的全面而深入的传释和想像。

就《圣经》而言,引起现代作家关注的首先是它的话语力量。周作人就认为:“英文《圣书》的文艺上的力量,大半在于此二者:其一是它的非意识的讲究风格,这个要求在成书的那时候恰巧正布满世间;其二是它的用语的简单直截无所羞耻的魅力。”^②《圣经》语言很有个性和风格,如行文的直率、自然而流畅,“非意识”的简洁和精炼,结构的对称性,追求表达的象征和比喻,拥有“无所羞耻”的语言魅力和来自“世间”的民间风格。周作人的看法也得到了其他现代作家的认同,沈从文就认为《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让他“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③事实上,沈从文小说的自然、流畅,典雅而又近口语的行文方式,与《圣经》就有相当紧密的传承关系。老舍也从“英文圣经,与狄福、司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中体会到了“最简劲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的道理。^④文学史一般认为老舍小说的简明、通俗和浅近的语言风格来自于市民礼仪的口语传统,在这一点上,显然也有《圣经》语言资源。《圣经》语言在自然、简洁和精炼之外,还有另一套行文风格,也就是鲁迅所赞赏的“幽邃庄严”^⑤,即追求语言的修饰之美,善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冰心从《圣经》的“耶稣讲天国,也是把天国比做具体的事物”的语言技巧里,领会到“会演讲的人,多是用比喻,以具体的事物去形容抽象的东西”的文学方式。^⑥一般文学史上有“冰心体”的说法,主要是指她散文文体成熟的艺术个性,在我看来,“冰心体”的背后也有《圣经》资源。穆旦的诗篇充满了心灵的痛苦和躁动,他的诗作大量引用

《圣经》语汇,形成“幽邃庄严”的意象世界。现代作家大量引用《圣经》语汇和意象,使用频率较高的有上帝、天国、伊甸园、乐园、福音、亚当、夏娃、禁果、魔鬼、耶稣、圣诞、十字架、圣母、圣子、天使、宁馨儿、忏悔、祈祷、安息、犹大、审判等等。相对于传统文学而言,《圣经》意象的出现不仅仅建立了新的意象空间,更主要的丰富了文学的意义世界,由意象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十字架”的使用就具有鲜明的悲剧感,如“我们是沉沦在/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在共同的运命底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莠萝集〉·献纳之辞》)“我只是一个弱者/光明的十字架/容我背上罢/我要抛弃了性天里/暗淡的星辰。”(《春水·二六》)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圣经》的语言和意象在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理想的、美好的,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意象,如“天国”、“天使”、“伊甸园”、“阳光”、“羊群”和“泉水”等;二是不理想的、具有负面价值意义的意象,如“魔鬼”、“审判”、“荒原”、“妓女”和“地狱”等。选择不同的语言意象也意味着具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冰心喜爱使用温暖的语言意象,如“天使”、“宁馨儿”(《分》、《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最后的安息》)、“上帝”、“祈祷”、“光明”、“圣子”(《繁星》、《春水》、《圣诗》、《往事》)等,这也传达出冰心温馨、澄明的审美之境。

现代作家还大量地直接引用《圣经》语句,出现西方新批评家所说的文学互文现象。冰心组诗《圣诗》分别引用《圣经》中的《创世记》、《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以弗所书》、《雅各书》和《启示录》等,完成对《圣经》的改写。曹禺在《日出》中引用了《圣经》的7段原文,显然有作“序”的涵义,当然也有象征的寓意。在巴金的小说《火》(第三部)、张资平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杨刚的小说《挑战》、苏雪林的小说《棘心》等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直接引用《圣经》原文的现象。引文有长有短,长则大段,短则一句。从叙述学角度上讲,它们起到了控制叙述节奏,创造结构张力的作用。就诗歌、散文等抒情性作品而言,“圣经引文”产生了语言

的象征和比喻意义。

文学语言生成为独特的话语方式。《圣经》的语言意象始终与它特定的话语方式相关,《圣经》的语言力量主要体现在它的话语结构之中,也就是它的抒情和叙事方式。《圣经》由祈祷、赞美、呼告等抒情方式形成了它的祈祷诗、赞美诗;由对话、演讲、书信、自传形成了它的“寻求”、“忏悔”、“转变”和“复活”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圣经》语言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了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文体模式。《圣经》中最有文学色彩的篇章是以《雅歌》、《诗篇》为代表的“祈祷诗”、“赞美诗”和“抒情诗”,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上帝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04篇)这些诗篇语言优美而寓意深刻。中国现代作家也创作有以“祈祷”为题的抒情诗作,如冰心的《晚祷》、周作人的《对于小孩的祈祷》、梁宗岱的《晚祷》、陆志韦的《向晚》、王以仁的《读〈祈祷〉后的祈祷》、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冰心的诗集《繁星》和《春水》充满着虔诚的祈祷情感,如“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它/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烦恼和困难/在你的恩光中/一齐抛弃/只刚强自己/保守自己/永远在你座前/作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赞美大灵。”(《晚祷》)她的《圣诗》可以说就是祈祷诗,“上帝啊/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奥秘/谁能够知道呢/是我们么?是他们么/都不是的/除了你从光明中指示他/上帝啊/求你从光明中指示我/也指示给宇宙里无量数的他,阿们。”(《圣诗·黄昏》)周作人对小孩有这样的“祈祷”：“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请赎我的罪吧。”(《对于小孩的祈祷》)祈祷与赞美是孪生姊妹,冰心的《圣诗》,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马槽》,徐志摩的《卡尔佛里》、《婴儿》和《天国的消

息》等同时也是赞美诗。如冰心的“光影里/宇宙的创造者,他——他自己缓缓的在园中行走/耶和华啊/你创造他们,是要他们赞美你么/是要歌颂他/要赞他/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阿们。”(《圣诗·傍晚》)“感谢上帝”是冰心作品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中心语词,她始终拥有一颗赞美、感恩的心灵。艾青赞美“圣母”与“圣子”：“产妇的血/在永不开花的马槽里/散下了最艳丽的花朵/那小生命/延续了母亲的余力。”(《马槽》)艾青诗歌有着鲜明的“颂歌”模式,如《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和《复活的土地》等,他“赞美”“歌颂”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他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与理想世界的呼唤者”^⑦。当然,我们不能说艾青诗歌的“颂歌体”就完全来自对《圣经》的简单模仿,但至少可以说受到了《圣经》的启示。

《圣经》中的《雅歌》深受现代作家的偏爱。周作人就认为：“《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⑧关于《雅歌》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讽喻故事,也有人说是神话,还有人说是牧歌。现代作家把它当做爱情诗。冰心曾记叙了一件中学时代仿用“雅歌”体写“情诗”的趣事,曾教她中学代数和历史的“T老师”,“美丽”、“和平”,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课“简单而又清晰”,“善用比喻”,“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⑨沈从文和端木蕻良也曾模仿过《雅歌》的写作方式,如沈从文的《我喜欢你》,其中有“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你怎么能知?”^⑩他的《月下》、《西山的月》、《第二个狒狒》和《神巫之爱》等作品,也直接仿效了《雅歌》的语言方式。《月下》写道：“‘求你我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我要在你的眼波中去洗我的手,摩到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

睛真是这样冷,在你鉴照下,有个人心会结成冰。”这是典型的雅歌句式,以对白、独白和伴唱的语言方式表达爱情。

我们知道,《圣经》文体有着大量的“书信”,多为传教的“信徒”所书,如“哥林多书”、“彼得书”、“犹大书”等。《圣经》“书信”的独特性在于“布道”,用它来传上帝的“话”。现代作家也使用“书信”体,它的自由、灵活的形式便于直接、坦诚地传达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冰心小说《悟》、《疯人笔记》以及散文《寄小读者》等作品采用了书信形式,同时也具有“布道”性质。如《悟》中“书信”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宇宙之爱”和“母爱”的感受,“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大地,便不住的徐徐前进”。《寄小读者》更是对“母爱”、“童心”和“自然”的“布道”,如“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朵鲜花,一张画片,一句温和的慰语,一回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在我们是不觉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单调的枯苦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赐。”(《寄小读者·通讯十五》)石评梅的《祷告——婉晚的日记》和《再读〈兰生弟的日记〉》,王统照的《十五年后》和王以仁的《孤雁》等作品也采用了书信形式来倾述主人公与基督和上帝之间所获得的启示和联系。

《圣经》叙事的基本结构是“罪恶与救赎”,是“布道与应和”,是“上帝说”与“我遇见”的相互对衬。在“上帝的声音”与“信者的跟随”之间形成了它多种原型结构模式,如“寻求”与“漫游”、“受难”与“复活”以及“忏悔”模式等。现代文学在表现有关《圣经》题材时也采用了这些结构模式,从而赋予作品丰富的象征意义。李健吾小说《使命》叙述在抗战爆发期间,六个中小学教员从一篇描写先知预言的小说中,认识到民族的“心理建设”和“道德建设”的伟大意义,他们决定做“一粒种子”,到乡村去“布道”,“把种子撒在最深厚的田野”。他们在乡村里“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却遭到农夫农妇们的“围观”和“讥笑”。他们感到无法“钻进”农民们“那层坚韧的外皮”,“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后来,他们看到乡村里的一座天主教堂,势力很大,

人们非常虔诚地相信“神甫”所说的话,“神甫”“在寨子扎下根,而且根扎的那样深,人民的身体和灵魂一起收入他的掌握”。他们从“神甫”那里获得了信心,“把真理传给别人,安慰只在你们自己的心理”。他们告别了村子,身后的教堂响起了“钟声”,“太阳跨过树梢,也露起头了”,看到了一片希望。小说显然借鉴了《圣经》中的“寻求”、“漫游”的象征结构模式,“使命”与“布道”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求道的过程。

许地山小说《玉官》就采用了“寻求”、“漫游”的结构模式,小说叙述一位中国基督徒在“信教”与“吃教”、伦理之爱与神性之爱的矛盾冲突中,经过艰苦而曲折的寻求过程,最终获得了真实的信仰。小说以“想起来直像是昨天的事情,可是前前后后相隔几十年”的回忆性视角展开叙述,寡妇玉官一心想抚养儿子长大后,谋得一官半职,自己也可得一个封诰,以表贞节。谁知小叔子粪扫心怀恶意,她只好求助于邻居基督徒杏官,杏官引荐她到一牧师家里做事。玉官对洋教怀有恐惧,离家时还在“神位和祖先神祖前插一炷香”,“默祷半时”。谁知一到牧师家,洋主人就给她传教,一年之后她也就“入了教”,成了“圣经女人”。但她仍不能忘记祖先的祭祀,否则,“那是大逆不道,并且于儿子的前程大有关系”。玉官虽在乡下传教“著了名”,但仍时时记住“祖先崇拜”,“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小说在传统道德名义与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展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心理困惑,逼视她的复杂性,出色地刻画出人的心理深度。玉官又经过几次反复与磨难,男人陈廉的诱惑,婆媳间的矛盾,她一边行着传教之事,一边深藏着“封诰”与“贞洁”的记忆。最后在“封诰”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她感到“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于是开始“忏悔”过去的一切,又回到了乡下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担任了小学校长,把“不求报酬的工作”当做自己最真实的“荣耀”。小说结束时,写她带着“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程》,一本看不懂《易经》”,悄悄地“上路”了。在一定意义上,《玉官》也是许地山创作的一部的《天路历程》,展示的是玉官精神的“寻求”和“漫游”的复杂过程。

文学史称冰心小说为“问题小说”，因为它提出了人生中的“家庭”、“爱情”和“幸福”等问题。人们较多关注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而忽略了小说处理这些“问题”的象征结构。实际上，这些小说都隐含有一个从“受难”到“复活”的象征结构，如《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超人》和《悟》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开始常对现实和人生产生悲观、绝望的看法，这些看法和认识逐渐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人生的意义何在？”他们孤独地思索，无法找到答案，以至于产生绝望、厌世情绪。后来，他们从“自然”、“童心”和“母爱”之中获得了“爱”的启示，很快甚而是瞬间就会发生精神的“转变”和“复活”。在一般事实层面上它是难以置信的，实际上却涉及一个价值信仰问题，强调的是信仰对于人的“复活”和“启示”作用。王统照的小说《微笑》也描写到犯人阿根在出狱后，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有些知识的工人”，是因为他忘不掉信仰“基督”的女犯人所曾给予他的短暂的“微笑”，由此带来了人生的大转变和精神的复活。郁达夫的小说《马缨花开的时候》叙述“我”在一个教会慈善医院休养，受到医生粗暴、不负责任的对待，“我”非常生气，但因“圣母玛利亚显灵”和牧师的教导，使我的心情变得愉快而高兴起来。

“忏悔”结构也是现代文学的一种结构模式。郭沫若的小说《落叶》、《圣者》和自传《漂流三部曲》，郁达夫小说《沉沦》，鲁迅小说《伤逝》，曹禺戏剧《雷雨》等都使用了“忏悔”的叙事结构。“忏悔”

结构一般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罪恶”的沉沦与欲望，二是因“忏悔”而获“新生”。1936年出版的《雷雨》初版本在其设置的“序幕”里，周朴园走进了教堂，“尾声”又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正文以回忆形式展开。整个戏剧就像一篇周朴园的“忏悔”祷文，作这样的结构处理显然有着“忏悔”的寓意。

- ①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 ②周作人：《论左拉》，载《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 ③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 ④老舍：《我的“话”》，《文艺月刊》，1946年6月16日。
- ⑤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 ⑥冰心：《写作的练习》，《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 ⑦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
- ⑧周作人：《〈旧约〉与恋爱诗》，《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版。
- ⑨冰心：《我的老师》，《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 ⑩沈从文：《我喜欢你》，转引自《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作者简介：王本朝，1965年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武汉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力月）